学术专论

扬州学派形成考论

冯　峰

［摘要］江北古学的兴起，由王念孙首倡，以汪中为中介，结合了李惇、贾田祖、刘台拱、朱彬等学者，组成一学术社群，抨击宋儒之学，宣扬考据学风气。扬州学者建构了考据学系谱，以团结同道。此外，婚姻圈和服务于幕府也为扬州学者提供了相互之间的认同，为学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扬州学派　古学　学术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1）－02－0031－10

Formation of the Yangzhou School

The rise of the ancient textual criticism in Jiangbei , was initiated by Wang Niansun , who combined with Wang Zhong and later Li Dun , Jia Tianzu , Liu Taigong , Zhu Bin and other scholars to form an academic community. These scholars criticized the Confucian lear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to promote a culture of textual criticism. The Yangzhou scholars constructed the genealogy of the textual scholars in order to unite likeminded fellows. In addition , through intermarriage and service as secretaries in yamens they developed a mutual identity for Yangzhou scholars and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school.

前贤论扬州之学，较早的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章太炎的《清儒》一文将乾嘉汉学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其学好博而尊闻”，皖派则“综刑名，任裁断”，太炎以戴震为乾嘉朴学之正传，而以惠栋为歧出。而扬州学者如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被归入惠栋之吴派，因其“陈义古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而王念孙、王引之则归入皖派，“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刘师培论扬州之学，也把汪中、李惇、贾田祖等人归入所谓掇拾之学，而以王念孙、任大椿、阮元、焦循能传戴震征实之学，而征实之学转而又为仪征刘氏所继承。[①] 章、刘二氏都不认为扬州学派为一整体，而根据学风将扬州学者加以分类。

张舜徽先生始明确指出扬州学派自成体系，“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构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②] 此后，学者论扬州学派都标明其独特之地位，或认为乾嘉考据学应在吴、皖之外，加上扬州一派，或以吴、皖、扬州学派为乾嘉学术三个不同发展阶段。[③] 关于扬州学派的起源，或认为与戴震皖学更近，能继承皖学并发扬光大，或认为扬州学派实起源于本地之学术传统。[④] 总之，扬州学派的研究现在已渐成显学。

然而，以上基于学风、地域之特色的研究，难免带有研究者主观判断和“后见之明”，而忽略当事人的自我认识。如把汪中划入惠栋吴派，可汪中自己却说治学“实事求

［收稿日期］2010－10－20

［作者简介］冯峰（1977—），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安 710062

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又如把扬州学者汪中、李惇、贾田祖和王念孙、任大椿、阮元、焦循相区别，就显然与当时汪、李、贾等人和王念孙结为一社群，共同发展江北古学的事实不符。而当学者强调扬州学派与皖派的密切联系[⑤]，或强调扬州之学起源于本土的时候，都或多或少与扬州“古学”初兴的背景有一定的距离。

本文讨论两个问题：其一，从当时学者交游的情况，考察江北考据学兴起的过程；其二，讨论扬州学者通过怎样的方式结合为一个学术的共同体。本文目的不在推翻前贤的论断，而在以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扬州学派的形成，以就教于方家。

一、“古学”初兴的背景

在扬州学者群体兴起时，惠栋、戴震是当时公认的考据学权威。惠、戴二君与扬州渊源颇深。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大力倡明学术，延请惠栋、戴震到府邸做客，一时汉学风气波及扬州。[⑥]但此时，扬州本土的学者尚年幼，李惇 23 岁，任大椿 19 岁，汪中、王念孙 13 岁，刘台拱 6 岁，朱彬 4 岁。只有贾田祖 43 岁、程晋芳 39 岁，生当中年，但贾田祖皈依考据学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并未受到惠、戴二人引领学风的影响。[⑦]虽然，任大椿、程晋芳乾隆二十年代已深受京城方兴未艾的考据学影响，但是他们长期居住外地，未能把初兴的考据学风带到扬州。

那么考据学究竟在扬州学者中是如何传播开的？汪中为李惇作“墓志铭”中提到：

> 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倡，而君（即李惇）和之，某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⑧]

明确提到王念孙倡导风气，李惇、汪中、刘台拱为继承风气者。下面略作释证：

在扬州学者中，王念孙确实是最早接触考据学的。王念孙幼时，其父王安国聘戴震为教师，为王氏很早就打下了良好的考据学基础。丙戌（1766 年）始入都会试，王念孙又追随考据学的积极赞助者朱筠左右，还结识了任大椿，相与论学，于顾炎武、江永之音韵学已间有批评。[⑨]乾隆三十七年，王念孙再应试不第，在京城结识了同赴会试的刘台拱，于是在京城订交。这时，两人可能在学术上已有所交流。同一年，刘台拱从京城返乡，过泰州，又结识了汪中。汪中在这一年已先与李惇订交。[⑩]王念孙、李惇、汪中、刘台拱诸人在乾隆三十七年，因赴会试或乡试而机缘巧合，互相结识。

汪中在结识王念孙之前，对考据学并无特殊的兴趣。杭世骏主讲安定书院时，曾赞赏汪中的考证才华，汪氏二十五岁时开始钻研毛诗和三礼之学，但是此时汪中的兴趣主要在文辞，并未得闻考据学的方法。[⑪]汪喜孙在叙述其父汪中学术历程时，也强调了汪中在朱筠幕府的经历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乾隆三十六年，朱筠南下任安徽学政。朱筠与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等是乾隆十九年的同科进士，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在京城宣传戴震之学，引领了乾隆二十年代的考据学风。到了三十年代，他们则借外任之机，将考据学传播到各地。[⑫]朱筠在任上就广招各路学者，校勘古籍、访求遗书。一时，邵晋涵、王念孙、汪中、章学诚、洪亮吉等人，齐聚府中，畅谈经义，于朱筠官邸太平使院开辟了一个考据学的大本营。考据学的治学方法，用戴震的话，就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⑬]，讲究从审音识字入手，循序渐进地掌握经典中的“道”。朱筠在安徽任上刊行《说文解字》，他还鼓励年轻学者研究小学，如邵晋涵正是在朱筠影响下，立志研究《尔雅》的。[⑭]乾隆三十七年，南下避祸的王念孙来到太平使院。该年冬，年轻的汪中也来到太平使院。[⑮]正是在这里，汪中于小学“始窥门户”，开始以考据学为志业了。而汪中和王念孙也定下了“廿年性情学术之交”，[⑯]扬州学派的两个核心人物由此达成了推广考据学的联盟。

经过太平使院的考据学洗礼后，汪中成为了扬州考据学最积极的宣传者。汪中为李惇写的“墓志铭”，突出墓主在传播考据学中的地位，事实上，汪中才是考据学传播的中介人物，他受王氏影响，转而影响了其他扬州学者。如汪中在太平使院与朱筠、王念孙共校

《大戴礼记》，汪喜孙说，汪中“是时所校书多述王先生说”，可见此时汪中深受朱筠和王念孙校勘方法的影响。乾隆三十九年，客居宝应的汪中与刘台拱、朱彬又同校该书，汪中的校勘方法又影响了刘台拱和朱彬。[17]后来刘台拱、朱彬对于礼学研究的兴趣，与汪中带来的考据学风气，恐怕大有关系。

王念孙在江北考据学传播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乾隆四十一年到四十五年，王念孙蛰伏湖滨精舍，专心著述，时贾田祖、李惇常来拜访王氏。贾、李二人是扬州学者中较为年长的，贾氏大王念孙 30 岁，李氏大王念孙 10 岁。贾田祖乾隆三十八年也入朱筠幕府，在那里他结识了汪中、王念孙，且可能对念孙的学问大为叹服，因此不惜以年长前辈，携李惇，虚心问学。贾、王、李三人皆好饮，“每酒酣辄钩析经疑”。乾隆四十二年春，贾田祖、王念孙、李惇相聚，为汪中北上送行，席间“钩析经义，间以歌诗，往牒旧闻，泛演旁出，嘲噱风生，戏而不虐”[18]，聚会中诗歌唱和，但更主要在讨论经义。此年五月贾田祖去世，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当时他已身染疾病，仍不负诸友，毅然赴会。李惇不久将为贡生，因贾田祖之死，“遂不入试”，以示纪念。[19]这样的聚会在乾隆四十一年到四十二年间，一定举行了多次，李惇和贾田祖正是通过这样的聚会，逐渐融入了考据学的圈子。[20]

综合上述，汪中、李惇、贾田祖、王念孙、刘台拱、朱彬等人显然就组成了江北考据学的核心成员。

但是由于王念孙大多时间在京城或外任做官，刘台拱亦入京后赴任丹徒训导，在扬州本地及其周围地区活动的，主要是汪中、李惇、贾田祖。汪中、李惇、贾田祖渐渐开始在扬州本地掀起一股激进的考据学风气。据称，贾田祖“性明达，于释、老神怪，阴阳拘忌，及宋以后禅学无所惑”[21]，而李惇“知鬼神情状，不惑于非类。与宋以后愚妄之学，距之尤力”。[22]汪中也是“性情伉直，不信释老、阴阳、神怪之说，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学……且言世多淫祠，尤为惑人心，害政事。见人邀福祠祷者，辄骂不休，聆者掩耳疾走。”[23]他们三人抨击阴阳神怪之说，驳斥宋儒性命之学，“尊汉抑宋”的取向非常鲜明，故在扬州学者中掀起了一股激进的学风。

其激进的程度可以汪中对文人的态度为例。汪中给刘台拱的信中提到，“中至江以南，所见才俊之士以常州为最，此时秀出者约四五人，惟是以作诗为性命，而以袁枚为宗师，毁誉从违，惟其所向，可不谓‘秦无人’乎?”又云，“说经之文，以明切为贵，可不必蹈文士常蹊。”[24]汪中对常州才俊之士，效仿袁枚以诗为尚，或偶尔说经，不脱文人习气，极为反感。又如对当时声势浩大的桐城派，汪中说，“吾所骂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乱苗尔，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之哉?”[25]另一阳湖文派出身的洪亮吉，虽致力研习经学，也被汪中指责为“妄人”。[26]汪喜孙为其父所作年谱称，“同时袁知县枚、章进士学诚、张舍人埙并以诗文名，先君辩论无所让。”[27]汪中显然是以考据学的卫道士自居，起而批判其他兼治经学的士人群体。

在汪中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考据学在江北迅速传播开来。当时考据学的影响力，我们还可以宝应宋学传统的转变为一视角。在江北考据学兴起之前，宝应县的宋学传统实际上是扬州地区的显学。生当康熙时期、任过翰林院编修的王懋竑编《朱子年谱》，高唱“道问学”之宗旨，而另一士人朱泽沄虽偏重陆王“尊德性”一派，大体都在理学之范围，[28]朱、王二氏相唱和，使宝应宋学已蔚然成风。朱彬所撰刘台拱“行状”称:

> 年十三四，后同里王洛师先生学，为文，先生老于文律，犹及方望溪、储中子诸人之门……年十五，见王予中、朱止泉两先生之书，欣然有得，始研宋程朱之学，以圣贤之道自绳，而于文章弗屑也。[29]

刘台拱少时所习乃王懋竑、朱泽沄之宋明理学，而在文章方面，受王洛师倡导之桐城文派影响，而王洛师即王懋竑之子。朱彬乃朱泽沄同族，刘台拱与朱彬又为表亲。以师弟、亲戚关系为纽带，刘台拱和朱彬显然继承了其乡的学风。

但是，宝应学风在江北考据学兴起后受到

极大的挑战。为人“恂恂退让”的李惇对有宋学根底的刘台拱，曾大加斥责，嫌其非考据学之“纯儒”。[30]当时，刘台拱在强大的考据学压力之下，已经在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宋学取向，把宋学收缩为一种修身方法，而在治学上皈依考据学。试看诸友对他评价:

> 先生慎于接物，尤廉于取……邵学士曰，“予游京师，交友中渊通静远，造次必儒者，端临一人而已。”[31]

> 盖予于淮海之交，有四士焉：训导宝应刘台拱，有曾闵之孝。[32]

刘氏的德行确实保留了宋儒的风范。不过，在治学方面，江藩说:

> (刘台拱) 然与人游处，未尝一语及道学也。君学淹博，尤邃于经。解经专主训诂，一本汉学，不杂以宋儒之说。[33]

江藩对刘台拱纯依汉学、不杂宋学的治学取向概括得很明白。即使考虑到江藩有严格的汉宋门户之见，结合其他学人段玉裁、王念孙等对刘台拱治学成绩的评价，也可知，刘台拱对于考据学方法是很重视的。《刘氏遗书》所收刘台拱著作，大多都使用考据学方法，或考证音韵、文字，或讨论古代礼制。汉学大师惠栋曾为他的“红豆山房”题书“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可以作为刘台拱学行的切实写照。宝应宋学另一代表朱彬晚年编成的《礼记训纂》一书，堪称其一生礼学研究的总结，也充分吸收了友人刘台拱、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邵晋涵等考据学家的见解。[34]在强大的考据学压力面前，宝应宋学传统在乾嘉时期已改变其最初之面貌而尽力融入了考据学的方法。

不过，刘台拱反过来也调和了汪中的激进风气。汪中对交友极为苛刻，且对天下士人品评甚是严格，但因敬重刘台拱的德行，而对他大为折服，说“刘君欲吾养其德性，而无聘乎血气”。[35]汪中因此为李惇和刘台拱作调人，劝李惇不要对朋友过于严苛，并称大家可以“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江北考据学内部激进派与调和派之间的冲突，汪中明显站在了调和派一边。

刘台拱调和汉宋学风的形成与他在京城的经历大有关系。刘台拱从乾隆四十三年到五十年间除偶尔返乡，常居京城，耳濡目染了当时考据学中心的学风。刘氏“行状”称:

> 先生乃留京师。时朝廷开四库馆，方闻辍学之士毕集，大兴朱学士筠，歙程编修晋芳以友天下之士为己任，休宁戴庶常震、余姚邵学士晋涵适被征，海内知名之士待召公车，歙则程君瑶田、嘉定钱君塘为之最，同郡官京师者则王观察念孙、任侍御大椿，并与先生为昆弟交，相约稽经考古，旦夕讲论，务求底于至是，而后即安。先生齿最少，每发一义，诸老生莫不折服。[36]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吸引了四方考据学之士云集京城，造就了考据学的空前盛况。时贤朱筠、程晋芳、任大椿等都与扬州学者有密切的关系，而刘台拱的旧识好友王念孙经历了四年湖滨精舍的蛰伏之后，也于乾隆四十五年入京。当时，刘台拱年甫而立，在京城诸儒面前虽属晚辈，但已经“稽经考古”、小有名气了。

刘台拱与当时京城中调和汉宋取向的士人往来密切，如名士翁方纲。翁方纲在京城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充任四库馆纂修官，成绩卓著，精通目录学，喜好金石文字。同时，翁方纲又是个道学先生，汪中因《墨子后序》一文褒扬墨子之学，以墨子与孔子等列，而受到翁方纲的强烈批评，甚至建议剥夺汪中的功名，已为人们所熟知。当日四库馆中，翁氏调和汉宋的治学方法，与纪昀等汉学家是有着重要区别的。

翁方纲对刘台拱极为赏识，称赞刘台拱“学广而气醇”，又说“今之精研三礼者，吾最许宝应刘端临”。他鼓励刘台拱:

> 近代治《仪礼》者，可谓勤且博矣……名物之学，迩日歙程勉之与昭阳任幼植各有用力处，其书亦渐有端绪矣。惟篇目之学最难，宝应刘端临意见颇正，而搜采未全。[37]

无疑是说，治《仪礼》名物制度考证固然重要，而礼经篇目的整理亦大有可为。戴震讲究从名物制度入手以考证古礼，程瑶田和任大椿二人的礼学名著，堪称是将戴震的理论加以落实，发扬光大而完成的“典范”之作。

对《仪礼》本经的整理，则是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以来宋学治礼的方法。翁方纲指出不同于主流考据学的治《仪礼》的另一条途径，未必没有与之相抗衡的意思。受他影响的刘台拱后来自觉综合了考据学、宋学方法治《仪礼》，果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38]而求学返回江南后的刘氏也凭借他的调和主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扬州考据学的激进风气。

二、扬州考据学群体的形成

本节将讨论扬州考据学者如何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这包括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学者通过塑造"学统"的方式，构建考据学的价值体系，同时也为自己在学统中安排位置，从而形成学派主观价值上的认同。同时，学者还通过一些客观的组织方式结合起来。[39]

在考据学兴起时，为了形成一套学问的价值体系，学者们首先构建了考据学的学术系谱。也就是，把他们认为可以代表考据学典范的人物编排组合进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所谓的"学统"。然后，可以为自己在学统中安排位置。"学统"的构建就成为把个体学者结合为共同体的粘合剂。汪中说:

> 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攻古文者，阎氏也；专研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也。[40]

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六人，构成了汪中心目中的"学统"。汪中曾欲作《国朝六儒颂》，以颂扬诸人对古学的贡献，可惜未成。古学之统系，唐宋以降已绝灭，自清代才有继起者，与韩愈的"道统"之说，何其相似，其中都有"建构"的意味。通过回溯的方式，抬高早期某些带有考据色彩学者的地位，也是当时考据学家的惯常做法，如朱筠在安徽学政上建议江永附祀紫阳书院，钱大昕等人抬高阎若璩的学术影响力都是显例。[41]而汪中完善了这些方法，进一步明确了顾炎武到戴震的古学系谱。近代章太炎、梁启超将乾嘉学术分为吴、皖两派，以惠栋、戴震分别为代表，然而，在扬州时人眼中，戴震综合了清初顾炎武以来到惠栋的"古学"成就，惠、戴乃后先相继而非并列的关系。

顾氏以来的"古学"，如汪中所说，到戴震而集大成，而扬州学人则试图接续戴氏之后的"学统"。以宣传"古学"最力的汪中为例，他积极与戴氏之同侣或后学相交。他给刘台拱的信中提到，"去年交程举人瑶田、洪中书榜。二君与金殿撰于戴君之学，皆可云具体。又长夏客江宁，与钱少詹士相处，日夕谈论甚契"，说程君"有体有用，不可不纳交之。"[42]汪中经王念孙介绍认识程瑶田，他与程氏、金榜、洪榜交好，显然欲从他们那里得闻戴震治学的方法。汪中对程瑶田的《通艺录》极为叹服，二人往来讨论古礼，汪中致程氏的信中说，"某病中百虑萦怀，深恐不起，而足下则时时梦见之，晤语如平生"[43]，可见交谊之深。钱大昕是将戴震推向考据学盟主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也是戴震重要的学侣。他与汪中经常讨论经史金石之学，汪中甚至称赞钱氏，"其高出戴君不止十等，诚一代之儒宗也"。[44]汪喜孙评价其父汪中的学术成就提到，"至若经史辞章金石之学，贯穿勃穴，靡不通擅，则顾宁人导之于前，钱晓徵及先君子继之于后，可谓千古一时也"[45]，也表明汪中在治学上与顾炎武、钱大昕一脉相承。其中意思很明白：以钱大昕、程瑶田为中介，戴震所代表的"古学"正统通过汪中等人的努力，已由扬州的学者继承了下来。

前文指出，汪中讲江北古学初兴时，只提到了王念孙、李惇、汪中、刘台拱的名字，然而到了扬州第二代学者[46]手中，扬州考据学的系谱添列了更多的当地学者，进一步完善了。焦循说，"扬州之士，知屏俗学，咀茹六经，自少宰得二君（汪中、顾九苞）始也。于泰州得陈燮理堂，于仪征得江德亮成嘉、程赞和中之，于高邮得宋绵初守端，于甘泉得郭均守民，于宝应得刘玉麟又徐，皆升高能赋，作器能铭。"[47]不仅如此，还将扬州古学起源比汪中更向上推，阮元说，"高邮贾田祖字稻孙，开吾郡经学之先，与同郡李孝臣惇、王怀祖念孙友……同时讲古学者，兴化任子田大椿、顾文子九苞，江都汪容甫中，宝应刘端临台拱，声应气求，各成其学。是时元和惠氏、休宁戴氏

大兴古学于江以南，而江北则诸君子为之倡。”[48]稍加对比可知，阮元的这段话显然综合了汪中的两段话而来，只是将扬州古学渊源更上推到贾田祖。而江藩的名著《汉学师承记》，共收入扬州籍学者 14 人，但许多人的传记极为简单，而他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却只收入这 14 人中任大椿、刘台拱等 4 人之作，可见其他扬州学者未必在古学上有多大造诣，他这样安排不过是褒扬其乡学术的虚赞之辞罢了。总之，到了阮元、焦循、江藩等人手中，扬州考据学的系谱不仅被拉长（上溯至贾田祖），而且被放大（列入古学谱系人数更多），“层累地”造就了江北考据学的学统。

“学统”的塑造果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桐城理学的卫道士方东树显然以扬州的学者为大敌，在他攻击考据学的名著《汉学商兑》里，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阮元，其他汪中、王念孙、王引之、刘台拱也榜上有名，而且全书供批判而引用的学者见解，汪中、阮元、焦循、江藩四人加起来就占到了一半多。[49]可见，在嘉庆中晚期，考据学之正传渐渐转移到了扬州，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认识，而这与江藩、阮元、焦循等扬州第二代学者进一步塑造“学统”的努力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学派的结合还有待于共同体的自我定位与评价。在承认学者个性特点的同时，学派同仁的学术评价，也在不断塑造着学派所期望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共同体对学者学术成就的评价，实体现学派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博弈关系。汪中说扬州学者“各成其学，不相依附”，已说明扬州学派开放性的特点。这里，我以王念孙、刘台拱和汪中为例来说明。

王念孙父子倾心于小学，念孙说，“余自壮年有志于许、郑之学，考文字，辨声音，非唐以前书，不敢读也”，还主张“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明”[50]，已清楚说明了他治学的取向。故汪中论当代通儒八人，而王氏父子已占两人，“今时古学大兴，经学则程、戴，史学则钱、邵，小学则若膺及足下父子，若文章一道，中欲置身其间，盖有志不逮也。”[51]经学、史学、小学、文章组成一学问重要性递减的序列，极为孤傲的汪中，能以小学许王氏父子，自己只忝列文章之末席，可见对王氏的推崇。焦循称赞王氏的《广雅疏证》、《经义述闻》，“高邮王氏，郑、许之亚。借张揖书，示人大路。《经义述闻》，以子翼父。”阮元也说，“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贯通经训，兼及词气。今申伯侍郎刻成《释词》十卷，元读之，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共证此快论也。”[52]此三家评论都集中在王氏父子的小学，共同体与王氏自己的定位基本相合。在扬州诸家中，王氏堪称“专门”之学。

汪中以“通学”的面目出现。汪喜孙赞誉他“经史辞章金石”无所不通。王念孙说，“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挈其纲维。余拙于文词，而容甫淡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学不若容甫之大也”[53]，称赞汪中之学特点在“大”。刘台拱评价汪中，“博闻强识，通识古今，才、学、识俱有以胜人。为文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风雅，卓然成一家言。”[54]当时，经学、文词难以兼通，如段玉裁说，“工文词者不必通经术，通经术者不必工文词。惟《述学》兼而有之，在当代为有数之书”[55]，则汪中的“通学”形象愈发鲜明了。不过，汪中似乎更愿意成为古学“专家”，而对文辞不甚留意，他三十岁后所作文章常不留底稿，可为明证，因此把他归入文人治经之吴派或掇拾之学，未必能令他本人满意。诸友的评价还有意忽略了汪中“经世致用”的用意。汪中曾自述他为学，“中少时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以此不合于元和惠氏。所为文，恒患意不逮文，文不称物，不专一体。”[56]可见，汪中最看重的是他继承顾炎武的致用之学。乾嘉时人主要发扬顾炎武的考据之学，而对他的经世致用之学，则大多不感兴趣，如阮元把顾炎武的《日知录》收入《皇清经解》，就只保留了音韵考证之文，而尽删去经世致用之作。所以，诸友突出汪中的古学、文词成就，而忽略他的“致用之学”，是为了让汪中之学符合考据学的正统标准。

刘台拱则兼有专家与通才的特点。王念孙对刘氏有一段总评价，“邃于古学，自天文律

吕至于声音文字，靡不该贯，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与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征君阎百诗、先师戴庶常、亡友程易畴，学识盖相仲伯”[57]，把刘台拱兼采汉宋、兴趣广泛的特点概括得很清楚。实际上，刘氏在专经方面的成就也声誉斐然，如他的《论语骈枝》，以《尔雅》、《周官》、《礼记》、《谷梁传》之文说《论语》，与王念孙《读书杂志》“以诸经而证一经”的治学方法异曲同工，因此王氏说该书，“皆圣经之达诂，而传注之所未及。”刘氏在《仪礼》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著，王念孙说，“其疏释《仪礼》经文，毫发不爽。经所未言，皆能默会其意。既补郑、贾之缺，兼斥敖氏之妄。”[58]评价相当高了。当时，卢文弨校《仪礼》，以前辈学者就正于刘台拱。阮元初任詹翰，受命校勘《仪礼》石经，也千里传书，请教刘台拱，“素谂先生于礼经之学，尤为深邃，其于经文讹误，订正必多，字画偏旁，不少更正。”[59]这都说明刘氏所学自有专精之处。不过，虽然刘氏的学术兴趣相当广泛，如他于宝应文献搜罗完备，于文词一道略有小成，然而他的女婿阮常生总结他的学术成就，“先生邃于经，不屑以古文见，故所作辄弃，存者止十有六篇”[60]，还是强调他的经学造诣，而忽略文词的成就，充分体现了考据学群体的价值标准。

可以说，扬州第一代考据学家主要着眼于强调学者的“专家”身份，当时若精通文词，就说明学无所长，这也是汪中、刘台拱不屑为文词而乐为古学的原因。文辞在刘、汪二氏实在只是随手而为的副业。而到了第二代学者，对学术的评价则发生了变化，阮元说:

> 有陋儒之学，有通儒之学。何谓陋儒之学? 守一先生之言，不能变通，其下焉者，则惟习辞章、攻八比之是务，此陋儒之学也。何谓通儒之学? 笃信好古，实事求是，汇通前圣微言大义而涉其樊篱，此通儒之学也。[61]

阮元称汪中为“通儒”，不过与上文王念孙和段玉裁评价汪中为“通学”的内涵已大不相同: 王、段的评价乃指汪中能兼经学、文词两个领域的成就，而阮元的“通儒”，则指在经学领域会通诸家大义微言，而成一家之言。王、段等人的“通”，指对很多的领域知道得很少，而阮氏的“通”，指对很少的领域知道得很多。后一个“通”代表了学问的最高评价。在“通学”认识上的转变，体现了“古学”评价体系的发展，需要略作申论。

焦循曾指出，“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 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已透露出古学变迁的一些信息。汪中等人正当“古学初兴”，需要一二豪杰志士振臂高呼，先确立古学的地位，故宣扬古学高于辞章、八股，轻视文士治经，都是“存其学”的种种策略。而到了阮元、焦循等扬州第二代学者那里，由于古学已大兴，于是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陋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得深造而有得”，“乃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既业于经，自不得不深其学。于经或精或否，皆谓之学经，何考据之云然?”[62]焦循的言论出于嘉庆元年，而上引阮元文作于道光八年，反映了乾隆后期到嘉庆年间“古学大兴”后的弊端。那就是，人人追随考据学风气，动辄称颂许、郑之学，“陋儒”横行，学业不精，造成了虚妄的学风。这也是焦循力辨“经学”与“考据”，阮元呼唤“通儒”的时代背景。而针砭时弊的同时，所谓“通儒”、会通诸经的要求，也是阮元、焦循等扬州第二代学者的“夫子自道”，那意思，古学到他们的手中，才真正实现了“证之实而运之于虚”（焦循语）的治学之道，才真正完成了师、儒兼于一身的理想（阮元说，三代“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近代学者论扬州学派常突出其“会通”的特点，严格来说，扬州第一代学者仍以“专家”自居，到了扬州第二代学者才有此“会通”的自觉认识。

现代学人有研究机构和大学为“共同体”的组织，此自是乾嘉时人所不能想及。清代鉴于明代灭亡的教训和稳固统治的考虑，严厉禁止士大夫“结社”，于是清人之间常通过友人“文会”结伴同道，讨论学术。如具有代表性的是“修禊”，王念孙、刘台拱在京城就参加过朱筠、翁方纲组织的这类活动。其次，考据

学同道论学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书信来传达学术上的见解。扬州学者当然也通过以上的方式来结合同道，不过，这里我要讨论扬州学者两个较为特殊的结合方式。首先，扬州考据学群体以联姻的方式，使学者之间形成一个婚姻的集团。下面列出扬州学派的婚姻圈:

刘世謩（刘台拱父）娶朱安人（朱泽代女、朱彬姑)

汪中继室朱氏（朱泽沄之孙、朱彬从妹)

焦循娶阮孺人（阮元妹)

阮常生（阮元子）娶刘繁荣（刘台拱长女)

阮恩海（阮常生子）娶刘氏（刘台拱孙女)

这里需要说明几点: 首先，宝应刘氏与朱氏的联姻，为宝应学术传承提供了条件。刘台拱和朱彬成为姑舅之亲，当然更增进了他们在学术上的交流。朱泽沄笃信理学，刘世謩给刘台拱的信，常常要求端临遵循理学要求，可见刘氏、朱氏在学问取向上的共同点，是他们联姻的基础。其次，汪中的继室是朱泽沄的孙女、朱彬从妹，所以汪喜孙称朱彬为舅氏。汪氏的加入，使得刘氏、朱氏的婚姻圈进一步扩大了，所以汪中和刘台拱、朱彬的友谊背后实有三方组成的婚姻圈维系。焦循与阮元的结亲，代表了第二代扬州学者之间的连接。最后，阮元的儿子和孙子都娶了刘台拱的女儿和孙女，这使得阮氏与刘氏成为世代之亲，刘台拱的文集正是由阮常生、阮恩海父子两代收集并刊布的。于是，刘氏、朱氏、汪氏、阮氏、焦氏通过相互间的婚姻关系，结合为一个横向的扬州学者的互动纽带，而从刘世謩到阮恩海共五代人，跨乾隆、嘉庆至道光，从纵向上也延续了扬州学风在代际之间的传递。

艾尔曼在讨论常州今文学时，曾指出常州庄、刘二氏以宗族方式（并通过两族的联姻)，形成了一种对族内成员的庇护，从而保证两族成员能够在科举、教育和学术方面不断获得成功。他认为常州今文学的兴起与宗族的发展和两族的联姻是分不开。[63]一般来说，乾嘉时期各学派的结合都是通过师承的关系，惠栋和戴震的学派大都是如此。显然，扬州学者群体和常州的今文学家之间，通过婚姻圈的联系，在学派结合上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不过，两者也有区别，扬州学者的婚姻圈涉及家族更多，而常州学者只是限于刘、庄两家的通婚，然而，由于刘、庄二族婚姻关系更为稳定，所以他们社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而扬州的学者科举成功率低了许多。这也决定了，扬州学者群体大致是先有学术上的交流、认同，然后结成姻亲，而刘、庄二族则是先有固定的婚姻关系，然后才发展出常州独特的今文学理论。

其次，谈一谈扬州学者与幕府的关系。学者如何维持生计，也是学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艾尔曼认为，乾嘉时期学者担任书院的教职和为达官贵人入幕办事，表明了学者实现了职业化[64]，虽然职业化的程度究竟如何，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幕府和书院确实为乾嘉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钱大昕、卢文弨皆以书院为基地，常州学者以科举为业，那么扬州学者则主要以幕僚为生。下面列出扬州学者第一、第二代学者入幕的基本情况:

清代扬州学者入幕统计

李惇	1（彭元瑞 1)
王念孙	2（朱筠 2)
汪中	9（沈业富 1，朱筠 1，冯廷丞 1，江宁府某幕 1，总督某公巡抚某公 1，客江宁 1，毕沅 1，戴全德 1，应聘赴杭州 1)
江藩	4（王杰 2，阮元 2)
焦循	5（阮元 4，尹秉绶 1)
阮元	1（谢墉 1)

资料来源: 尚小明编著 《清代士人游幕表》（中华书局，2005 年)。括号前数字为学人入幕总数，括号内为所服务之幕主名及在其幕下的次数.

其中汪中入幕次数最多，汪中从小丧父，家庭困苦，十四岁就不得不靠卖书为生，成年后，以幕僚为业。当他无幕主可以依靠时，生活顿时便难以维持，“中依朱公，而朱公回京; 依冯公，而冯公远迹海外，时命如此，何以得食?”[65]“何以得食”一句，便凸显了汪中与幕府之密切关系。推荐汪中到朱筠幕的郑虎文赠汪中诗云，“经术首所崇，激劝醒迷复。君子应时须，学也中有禄。不干亦不矫，吾道惟自淑”[66]，是要汪中以经术为“干禄”，确实说明乾嘉时代考据学成为了谋生的手段。其

时，“四库馆”开，天下好学之士皆以幕府储备人才，汪中中年后家境渐有改观，他学术上起步和成就最辉煌的时期，也都是在幕府完成的，晚年还有幸入杭州文澜阁校理图书，正是乾隆年间的文化政策和养士风气造就了汪中的职业化契机。江藩和焦循也靠幕府为生，江氏和焦氏的家族都是祖上拥有财富的士绅，然而在江藩和焦循这一代由于遇到了江北灾害，失去了土地或资产，成为专门靠学术吃饭的士人。江藩和焦循同受邀，修纂嘉庆年间的《扬州府志》，而他们两人也都进入了阮元幕府，提供学术上的支持。

阮元仕途显赫，跻身疆臣大吏，所以对于其乡学者提携尤多。他的妹夫焦循先后四次进入阮元幕府，江藩也两次入阮元幕。江藩的名著《汉学师承记》正是由阮元刊刻，而调和汉宋之学的阮元，也同样支持出版了桐城名儒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在刊刻总结汉学成就的《皇清经解》时，阮元显然吸取了江藩的许多意见。如果说，朱筠幕府影响了王念孙、汪中、贾田祖等第一代扬州学者的话，那么阮元幕就成为扬州第二代学者江藩、焦循的学术大本营。幕府于是成为扬州学者以学术维持生计的庇护所，其于扬州学派的发展意义深远。

---

①章太炎《清儒》，章太炎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2-175页。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九。

②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③王俊义《论乾嘉“扬州学派”》(《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3期)、《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1期)。关于吴、皖、扬州学派为乾嘉考据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见陈祖武:《关于乾嘉学派的几点思考》，收于其著《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9-173页。黄爱平《清代汉学的发展阶段与流派演变》，《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卷。

④近来有学者强调扬州学风源于本土，见王章涛:《阮元评传》，广陵书社，2004年，第35-37页。

⑤扬州学者被认为直接继承了江永、戴震代表的皖派学风。在学术上两地确实颇有渊源，程晋芳、凌廷堪等学者是常居扬州的徽州移民。其他方面，扬州的商业发展与徽商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扬州考据学的兴起并非直接与戴震有关，更与程晋芳、凌廷堪关系不大，而是汪中积极地交游钱大昕、程瑶田、洪榜等能传戴震之学者，从而与皖派学风相联系的。详见下文论述。

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5-357页。

⑦以贾田祖为扬州学派“开山祖”，显然过信焦循、阮元褒扬其乡学术之辞，有失考证。

⑧汪中《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之铭》，《新编汪中集》，广陵书社，2005年，第480页。

⑨时王念孙读江永《古韵标准读》，对顾炎武分古音为十部已不满，后认为江氏之书也未尽善，而分古音二十一部。刘盼遂编《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0辑)，乾隆三十一年条。

⑩汪中与朱彬父子、李惇因参加乡试而相识于泰州。汪中与李惇订交，刘氏参加完会试后，过泰州，也与汪中订交。汪喜孙编《容甫先生年谱》(收于《新编汪中集》附录)，乾隆三十七年条。

⑪杭世骏主讲安定书院时，论及孟子“往送之门”，汪中引《谷梁》祭门、阙门以证孟子之说，已初显考证才华(《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八年条。)然而，此时汪中多致力于文辞，如推荐汪中到朱筠幕府的郑虎文，就是因为汪中的《哀盐船文》而对他刮目相看(《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条。)汪中《与秦丈西严书》云，他“束诗不讲，以并力于古文、经学”，也说明汪中入朱筠幕前尚在经学与文辞之间摇摆。可见他于三礼、毛诗虽已有心得，为转向考据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却还没有系统地接触从小学入手以研究经学的考据学方法。

⑫张维屏《纪昀与乾嘉学术》，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8年，第16-25页，第30-35页。

⑬戴震《戴震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40页。

⑭邵晋涵的主要兴趣在史学，他对小学的关注，显然受到恩主朱筠的鼓励。关于邵晋涵的史学兴趣，见章学诚《邵兴桐别传》，《章氏遗书》，卷十八。

⑮姚名达编《朱筠年谱》(民国丛书影印本)，乾隆三十七年条。

⑯《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

⑰《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三十九年条。

⑱汪中《大清故高邮州学生贾君之铭》，《新编汪中集》，第476页。

⑲《新编汪中集》，第480页。

⑳有人以为汪中之学出于贾田祖，时人朱彬已辟此说(《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条。)李惇和

贾田祖虽然年长于王念孙、汪中，但对考据学的兴趣，明显受到了王、汪二人的影响。
㉑《新编汪中集》，第 476 页。
㉒《新编汪中集》，第 480 页。
㉓江藩、方东树著 《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34 页。
㉔刘文兴编 《刘端临先生年谱》(原载《国学季刊》3 卷 2 期)，乾隆四十一年条。
㉕《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 134 页。
㉖《新编汪中集》，第 438 页。
㉗《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条。
㉘张舜徽 《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1-40 页。
㉙朱彬 《刘先生台拱行状》，钱仪吉编 《碑传集》，中华书局，1993 年，总第 4038 页。
㉚《新编汪中集》，第 438 页。
㉛阮元 《刘端临先生墓表》，阮元 《研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 年，第 400 页。
㉜王昶 《四士说》，《春融堂集》卷三十五。
㉝《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 138 页。
㉞朱彬撰、饶钦农点校 《礼记训纂》前言，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 页。
㉟《新编汪中集》，第 430 页。
㊱《碑传集》，总第 4038 页。
㊲《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六年条。
㊳刘氏《仪礼》之学受到时贤的好评，详见下文。端临治《仪礼》极有成绩，可惜未能成书，今论《仪礼》之文收入《经传小记》。
㊴库恩关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对我们考察考据学群体的形成颇有借鉴意义。一般来说，现代科学“共同体”的结合大致需要以下几个条件：其一，形成了一套关于学问的严格的价值体系。其二，共同体往往通过某些组织结合起来，如研究机构、大学、学会等。其三，学术共同体还需要推广研究方法，不断地诞生足以作为“典范”的新作。参见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㊵《新编汪中集》附录，第 42 页。
㊶张维屏 《纪昀与乾嘉学术》，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8 年，第 46-47 页。
㊷《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四年条。
㊸《容甫先生年谱》，乾隆四十八年条。
㊹《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一年条。
㊺引自王章涛 《阮元评传》，广陵书社，2004 年，第 36 页。
㊻扬州第二代学者指出生于 1760 年以后者，如阮元、江藩、焦循，第一代指汪中、王念孙、刘台拱、李惇、朱彬，都出生于 1760 年以前。
㊼引自王章涛 《阮元评传》，广陵书社，2004 年，第 36 页。
㊽引自王章涛 《阮元评传》，广陵书社，2004 年，第 36-37 页。
㊾《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导言，第 18 页。
㊿引自《高邮王氏治学切要语》，《高邮王氏父子年谱》。
51汪中著、王清信、叶纯芳点校 《汪中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2000 年，第 277 页。
52引自闵尔昌编 《王石臞先生年谱》，序。
53《新编汪中集》附录，第 60 页。
54《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七年条。
55同上。
56《新编汪中集》，第 428 页。
57王念孙 《刘端临遗书序》，《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罗振玉辑 《高邮王氏遗书》)
58同上。
59《刘端临先生年谱》，乾隆五十六年条。
60《刘端临先生年谱·著作》。
61《新编汪中集》附录，第 57 页。
62《刘端临先生年谱》，嘉庆元年条。
63(美)艾尔曼著、赵刚译 《经学、政治和宗族》第二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
64(美)艾尔曼著、赵刚译 《从理学到朴学》第三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5《新编汪中集》，第 432 页。
66《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六年条。